

中共與印度夾縫中的尼泊爾

沈鈞傳

（國際關係研究中心研究員）

蘇聯自戈巴契夫上台後，推行改革開放政策，東歐國家也聞風而起，紛紛要求民主自由，放棄共黨統治，可是當民主改革成功之後，却帶來了新的種族和民族之間的衝突，對於這些國家尚未落實的民主政治，無疑是一項重大的打擊。印度號稱為世界上最大的民主國家，但是每次大選都充滿著血腥暴力和種族衝突，一九九一年的大選，因種族和宗教問題所引起的流血衝突，更是空前的激烈。可是位居希瑪拉雅山麓的尼泊爾王國，却從一個君主專制政體過渡到君主立憲，其過程雖然也充滿了血腥鎮壓和種族衝突，但是結局則相當平順，對於推動政治民主化的國家而言，尼泊爾的經驗，可稱之謂一個新的典範。

兩強之間難爲小

尼泊爾王國位於希瑪拉雅山脈的南麓，面積十四萬一千平方公里，約為台灣面積的四倍大，人口僅一千九百五十萬，略遜於台灣的二千零六十萬。^①尼泊爾北部隔希瑪拉雅山脈與我國西藏為界，南部和西南部與印度的比哈爾（Bihar）和北方（Uttar Pradesh）兩省為鄰，東部則與印度的西孟加拉（West Bengal）和錫金（Sikkim）兩省接壤，^②所以尼泊爾為中國與印度兩個大國間的內陸國家。一七六九年廓爾喀人征服尼泊爾，故我國清朝稱尼泊爾為廓爾喀。廓爾喀人勇敢善戰，曾不斷向外發展。清乾隆五十六年，即公元一七九一年，大舉入侵西藏，迫近扎什倫布，大肆擄掠。翌年，清高宗派大將福康安

註① 亞洲週刊，一九九一年七月二十一日，頁八。

註② 錫金於一九七五年八月被印度兼併，但中共並不承認此一現實。

安率軍征廓爾喀，橫渡鐵索橋，攻入尼泊爾。同年六月，清軍大勝，兵臨京城，廓爾喀求和，願臣服朝貢，清廷許之，遂班師回國，尼泊爾自是遂成爲我國藩屬，由駐藏大臣統轄之。^③中國與尼泊爾邊界長達九百六十公里，有二十多處關卡可供貿易往來，但是由於地處高山峻林，再加上氣候酷寒，中國西藏境內與尼泊爾的貿易往來受到相當大的限制；相反地，印度則居地緣之利，雙方交往頻繁而便捷，早在一七九二年，印度與尼泊爾即簽有通商條約，雙方貿易相當頻繁。十九世紀英國殖民統治印度期間，曾派兵征服尼泊爾。自此以後中國與尼泊爾的關係漸漸疏遠。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因廓爾喀兵團替英軍作戰而立下汗馬功勞，英國乃於一九二三年與尼泊爾簽約，承認尼泊爾爲一個獨立王國。

印度於一九四七年脫離英國獨立後，繼承了英國在尼泊爾的一切權益，當時中國內戰方熾，無力顧及印度在我國邊區的戰略部署。一九四八年，印度與巴基斯坦爆發克什米爾戰爭，印度空軍將大量部隊運往克什米爾東部的拉達克（Ladakh）地區，該地離我國西藏邊境僅四百八十公里，對於我國西藏地區的安危構成了威脅。一九四九年，印度出兵錫金，控制了印度通往西藏拉薩的交通要道，中華民國政府對此曾向印度提出了第一次抗議，此後不久，中國大陸淪陷，中共接著也向印度提出類似之抗議，這兩次外交抗議，對印度戰略家而言，無疑是一種新的挑戰，而且也正意味著中共將插手南亞事務。因此，印度爲了因應來自中共的威脅，乃於一九五〇年七月卅一日與尼泊爾簽訂和平友好條約，使尼泊爾的國防受制於印度，從此印度不僅得派遣軍事代表團和安全部隊長駐尼國境內，而且還協助尼國在尼藏邊界沿線建立軍事檢查哨，以便於偵測中共在西藏境內的軍事行動。^④根據一九五〇年的協定，印度和尼泊爾公民可自由進出兩國邊境，並得在他國購置房產和土地，從表面上看，這一協定具備了互惠互利的精神，但事實上，落後而貧窮的尼泊爾人，根本無力在印度境內購買任何不動產，尼泊爾的經濟和國防利益則全部受到印度的控制。中共眼看印度勢力已逐漸擴及西藏邊境，因此開始爭取尼泊爾王國的友誼，以便平衡印度在希瑪拉雅山區的戰略利益。於是當中共與印度關係逐漸惡化，邊境緊張局勢升高以後，中共於一九六一年決定和尼泊爾解決邊界問題，而且也開始協助尼泊爾建造兩條公路，其中一條由尼國京城加德滿都經邊境小鎮科達利（Kodari）到西藏首府拉薩；另一條則從巴德拉普（Bhadrapur）通往東部地區的奧蘭鍾（Olangchung），這兩條路正好對錫金形成側翼的包圍，印度對此一直視爲心腹之患，所以在一九七五年將這個保護國兼併，成爲印度的一個省。

一九六二年中共與印度發生邊界戰爭後，尼泊爾開始對中共有所懷疑，但是基於經濟的利益，對中共的經援仍大力爭取。不過爲了自身的安全，對於印度與尼國於一九五〇年所簽訂的和平友好條約，仍視爲保障尼國安全的唯一護身符，因此尼泊爾在一九六〇年代，在中共與印度兩個大國的夾縫中，一方面獲得中共的經濟援助，另一方面則擴大對印度的貿易往來。

註③ 世界各國憲法大全，頁四三九。

註④ Stephen Philip Cohen (edited), *The Security of South Asia, American and Asian Perspectives* (University of Illinois Press, 1987), pp. 40–41.

很顯然的，尼泊爾以等距外交來獲取實際利益。^⑤一九七二年比蘭德拉國王（Birendra）執政以後，有感於印度霸權主義高漲，眼見一九七一年印度與蘇聯簽訂友好和平合作條約後，竟然出兵東巴基斯坦，促成了孟加拉的獨立，使尼泊爾對於印度不得不有所戒懼。一九七五年又親眼目睹印度吞併錫金，其所帶來的震撼與不安油然而生。因此，比蘭德拉國王於一九七三年首訪北平，希望以漸進的方式改善其與中共的關係，以便擺脫印度的控制，走向完全獨立自主之途。尼泊爾在比蘭德拉統治時期，中共與尼泊爾的關係有了長足的改善，據統計，自一九五六至一九八九年期間，中共援助下的建設計畫多達四十二項，其中三十六項已在最近次第完成，其中包括公路、灌溉渠道、水力發電、製磚工廠、造紙廠、糖廠和紡織廠等。從一九八一年起，中共的企業開始和尼泊爾當地的廠商簽署合同，並從事勞工的輸出、技術人員交流和聯合開發方面的種種合作。據統計，到一九八九年為止，中共企業和尼國當地廠商簽有合作契約者，已有八十五項之多，投資金額高達一億三千七百萬美元，中共依約派往尼國工作的勞工和專家多達一千餘人。從中共的立場來說，這樣的作法乃是基於互信與互助，並不會干涉到彼此間的內政問題。^⑥不過從印度的觀點來看，尼泊爾與中共間的合作，似乎意味著有意擺脫一九五〇年以來加諸於尼泊爾身上的束縛，更何況尼泊爾在比蘭德拉國王統治下，不僅接受了中共的軍援，而且還鼓吹「尼泊爾和平區」的構想，對印度而言，此無疑是對一九五〇年條約的一項挑戰。

印度的不滿與報復

過去幾世紀以來，尼泊爾與中國關係的發展，由於受到高山的阻隔和氣候因素而先天上存在著難以克服的困難，因此在國防和經濟上，尼泊爾對印度的依賴程度是可以理解的，尤其最近四十年來，印度藉一九五〇年條約控制了尼國的國防，特別是自一九六二年印度與中共發生邊界戰爭以來，印度已將尼國視為國防安全的前哨，尼泊爾為中共與印度之間的緩衝國的地位，也已成為不爭的事實。在經濟上，儘管尼泊爾有意擴大對外經貿關係，但是尼國的對外貿易，幾乎有三分之二受制於印度，而這一結論僅只是根據官方公布的統計數據，如果再加上大量的邊境商業走私這一「非官方」的買賣來看，尼泊爾與印度的貿易額將可達到尼泊爾對外貿易的百分之八十五到九十之間。印度除了根據條約來影響尼泊爾的國防與外交政策外，在經濟上還可透過雙邊貿易和貨物過境來控制尼泊爾。根據一九七八年至一九八八年的雙邊貿易條約，尼泊爾和印度互享最惠國待遇，這一條約表面上看起來是平等互惠的，但是物資缺乏的尼泊爾，幾乎大部份工業原料、生活必需品、燃油、藥品

註⑤ Ferenc A. Vali, *Politics of the Indian Ocean Region: The Balance of Power* (N. Y.: Free Press, 1976), p. 106.

註⑥ John W. Garver, "China-India Rivalry in Nepal: The Clash over Chinese Arms Sales," *Asian Survey*, Vol. XXXI, No. 10, October 1991, n. 957.

均仰賴進口，而其中約百分之九十來自印度，中共運往尼國的貨物僅佔百分之一，而尼泊爾輸往印度的貨物，可以說少之又少，因此所謂的最惠國待遇，實際上獲利的只是印度而已。數十年來，印度幾乎壟斷了全部尼泊爾的對外貿易。尼泊爾為了增加稅收、充裕國庫，決定對印度貨物徵收百分之二百五十的關稅，這樣高的稅率雖然與其他國家相仿，但是在印度方面看來，尼泊爾的作法已違反了雙方的貿易條約。

另一項令印度感到不滿的事，乃是尼泊爾利用國際上的內陸國家貨物轉運權，以百分之六十的優惠稅率，從第三國將貨物經印度孟買港轉運尼泊爾，然後再以高價從尼泊爾邊境，以走私的方式運到印度各地，尼泊爾因而從中獲取暴利。根據國際慣例，沿海國家有義務向內陸的鄰近國家提供貨物轉運港的方便，孟買是第三國貨物轉往尼泊爾最近的港口之一，印度按例應提供這項方便，可是尼泊爾以低價進口第三國貨物，然後以高價銷往印度，如果這一事實確實無誤，尼泊爾政府理應自約束，可是尼泊爾政府對於印度的指責却未予理會，使印度政府感到極為不滿。因此，當一九八八年三月二十二日，雙方貿易條約期限屆滿前，印度要求尼泊爾將貿易條約和貨物過境轉運條約一併簽訂，此後並兩次延後簽約六個月，以便於一九八九年三月二十六日，貨物轉運協定期滿時，兩約再行一併簽訂，可是尼印兩國政府並未就兩項新約問題獲致共識。尼泊爾政府認為，兩約分別簽署乃是過去的慣例，而且貨物轉運是一個內陸國的基本權利，更由於涉及到第三國，所以也應該是持久性的，至於貿易條約則是階段性的、經常變動的，同時也是雙邊的。因此尼泊爾認為兩個條約應分開簽署，印度為此而對尼泊爾的猜忌更為加深。

此外印度對尼泊爾政府感到不滿的還有另外兩項因素。一為尼泊爾政府於一九八七年頒布了一項行政命令，規定所有居住在尼國境內的外國人，必須持有尼國頒發的工作許可證，方能在尼泊爾工作。印度政府認為這是對印度的「不友好行為」，並指責尼泊爾的這種做法，違背了一九五〇年兩國所簽訂「和平友好條約」的精神。根據該項條約的規定，兩國公民可以自由進入對方領土從事貿易和商業活動，根本無須辦理簽證或申領任何特許的證件。由於這一規定，大批印度人紛紛湧進尼泊爾，給尼國的社會和經濟穩定造成了一定程度的困難，而印度則認為，外國工人申領工作許可證的規定，顯然是專門針對印度人在尼泊爾的工作權。^⑦

另一個因素為印度對尼泊爾國王比蘭德拉在外交上有意擺脫印度的影響及接受中共的軍事援助，感到不滿。在外交上比蘭德拉國王處處標榜獨立的不結盟政策，而且在國際事務和南亞區域合作領域內扮演重要的角色，例如尼泊爾於一九七五年，在聯合國提出「尼泊爾和平區」的主張。尼國政府領導人曾多次發表聲明，為確保尼泊爾成為和平區，尼國將承擔應有的

註⑦ 人民日報（北平），一九八九年三月二十六日，四版。

義務，包括不允許外國在自己領土上建立軍事基地和從事敵視其他國家的活動；不參加軍事聯盟和不介入任何軍事衝突；不訴諸武力和武力威脅，和平解決國際爭端；尊重主權、獨立、不干涉別國的內政等等。這些主張充分表達了尼泊爾人民維護本地區和平和同鄰國友好相處的真誠願望。但是看在一向視尼泊爾為其勢力範圍的印度眼裏，顯然尼國要走獨立的外交路線，影響到印度在這一地區的利益。

至於尼泊爾與中共的關係，我們可以從比蘭德拉國王自一九七二年繼位以來曾先後六次訪問北平，以及中共領導人鄧小平、趙紫陽、李先念、李鵬等人也曾訪問加德滿都，再加上中共又是第一個公開支持尼泊爾和平區的國家看出其發展的趨勢。^⑧尼泊爾不斷地與中共接觸，當然引起印度的不安，而最令印度寢食難安的乃是尼泊爾接受了中共的軍事援助，根據印度時報的報導，尼泊爾曾向中共購買AK-47步槍、飛彈和高射炮等武器。^⑨這批軍火交易傳開後，對印度造成了前所未有的衝擊，如果所傳之購買防空武器和飛彈屬實，則印度難免會更加憂心忡忡了。不過尼泊爾駐印度的大使為這項傳聞作了如下的澄清，這位官員指出，中共並未出售飛彈給尼泊爾，而一九八八年夏季運達的一批中共製自動武器，屬防衛性質，旨在保護尼泊爾人免受恐怖主義份子的襲擊，至於其中包括有高射炮一事，乃是印度於一九七三年不願提供尼泊爾的要求後，不得不轉而向中共訂購，但其性質純屬防衛。^⑩尼泊爾官員的解釋似乎並沒有解除印度的疑慮。

印度對尼國施加壓力

尼泊爾自從比蘭德拉國王執政以來，就極思擺脫印度束縛，因此在外交上曾不斷和中共與蘇聯加強接觸，進而希望獲得經濟和政治上的援助，尤其中共為印度的宿敵，正是尼泊爾可資運用的最佳目標，中共亦正好利用尼泊爾對印度施加壓力，迫使其實在邊界談判上有所讓步。印度政府對於尼泊爾的所作所為，當然瞭如指掌，所以當印度和尼泊爾發生爭執時，尼泊爾採取親中共的政策，以便制衡印度，印度時報駐加德滿都的記者即指責尼泊爾政府公開玩「中共牌」。^⑪事實上，從一九七二年比蘭德拉國王繼位以來，印度已察覺到這位國王在外交和經濟方面的政策正圖改變，尤其當尼泊爾向中共購買武器與軍火之後，印度政府已在暗中培養尼泊爾政壇上的親印勢力，試圖以人民的力量來改變尼泊爾國王的專制統治，而且印度對尼泊

註⑧ 人民日報（北平），一九八七年九月十六日，版六。

註⑨ *The Times of India*, (Bombay), 12 April, 1989, pp. 4, 8.

註⑩ Niranjan Koirala, "Nepal in 1990: End of an Era," *Asian Survey*, Feb. 1991, p. 138.

註⑪ *The Times of India*, 13 April, 1989, p. 13.

爾政府所採取的種種有違尼印傳統關係的作法，雖然一再忍讓，但是爲了維持印度的國際形象，新德里當局並未立即採取激烈的手段。當一九八九年印度與尼泊爾因續簽貿易條約和貨物轉運條約，雙方看法發生了南轅北轍的歧見後，印度堅決地拒絕了尼泊爾所主張的兩約分別簽署的建議，而且爲了向尼泊爾施加壓力，竟然在一九八九年三月二十三日，前述兩項條約期限屆滿後，印度以兩國貿易和貨物轉運關係已失去法律依據而封鎖了印度邊境通往尼泊爾的十三個重要關卡，僅留拉紹爾（Raxaul）和賈巴尼（Jogbani）兩處比較偏遠，而且路況甚差的關卡，作象徵性的保留，以便供尼泊爾輸入醫藥、嬰兒食品和水泥等民生必需品。¹²印度這種以跡近經濟封鎖的方式，來迫使一個內陸小國簽署不平等條約的行爲，立即受到包括所有鄰國在內的一致譴責，巴基斯坦、孟加拉和斯里蘭卡均準備伸出援手，中共也開始搶修崩塌的「中尼友誼公路」，準備提供大量的燃油和日用品。

尼泊爾突然遭到印度的經濟封鎖後，尼國政府雖然向全國人民表示，國內儲存的主要貨物足可供應兩個月而不慮匱乏，但是當人民得知印度將於四月一日起，暫停對尼泊爾的出口後，尼國人民在面臨物資供應斷絕之際，開始在市場上搶購糧食、食用油和燃料油，整個社會已呈現慌亂和不安，尼泊爾的旅遊事業亦因而受到打擊，每年將近六千萬美元的觀光收益也大受影響。尼國政府爲了遏止人民的搶購風潮，一方面開始對民生必需品實行配給制，另一方面則希望與印度進行新的談判，以便打開雙方的貿易僵局。可是重開談判，正意味著尼泊爾必須讓步，所以當尼國外長烏帕得亞雅（Shailendra Kumar Upadhyaya）於三月二十六日訪問新德里時，雖然提出了兩國貿易條約和過境條約的草案，但是印度政府的態度則更爲霸道，當時的印度外長勞奧（Narasimha Rao）則表示，印度在制定其對尼泊爾政策時，其首要的考慮爲「安全利益」，任何談判必須以此爲原則。¹³由此可見，印度所關心的不是單純的貿易和過境條約問題，實際上尼泊爾與中共過於接近才是兩國不和的癥結。此後，尼泊爾外長烏帕得亞雅雖多次與印度官員接觸，希望在公平和尊嚴的待遇下談判新的條約，惟雙方仍堅持自己的立場，以致談判並無進展。印度外長勞奧於四月二十六日，在國會演說中表示，印度還希望與尼泊爾重議一九五〇年條約，這項被尼泊爾視爲不平等條約的「和平友好條約」的再被印度提起，很顯然的印度有意把尼泊爾再度變成印度的保護國。

印度與尼泊爾兩國的僵局持續三個月之後，尼泊爾國王比蘭德拉在六月二十日向國會第四十次會期發表國情咨文時指出，印度片面宣布廢除尼印兩國的貿易和過境條約，而且無情地封鎖尼國的經濟活動，使尼泊爾人民的生活陷入困境。因此他

註⑫ *The Times of India*, 25 March, 1989, p. 9.

註⑬ 文匯報（香港），一九八九年五月八日，版一。

重申尼國誠摯地希望與印度以談判來解決問題。¹⁴尼泊爾國王之所以親自出面呼籲印度認真進行談判，一方面固然因經濟問題，使尼國社會上人心浮動，另一方面印度所支持的尼泊爾國大黨和左翼各黨不斷進行接觸，其目的在要求國王解散封建而缺乏政黨支持的「評議會」（Panchayat），¹⁵這種由地方到中央的封建制度，雖然也具有議會的形式，但是却不是由政黨提名、經選舉而產生的代表所組成，所以基本上「評議會」制度只是御用的工具，根本缺乏真正的民意基礎。尼泊爾政府面對國內逐漸興起的民主思潮，了解其幕後受到印度的指使，但是鑑於民主是難以阻擋的潮流，一旦成為全國性的政治運動，尼泊爾君主專制制度將首當其衝，因此尼泊爾政府決定和印度妥協，希望能以此來保持王室權威領導，而印度外長勞奧在六月二十九日也提出了兩國談判的五項原則：(一)重新評估印度與尼泊爾的關係——建立永久友誼的新架構；(二)在文字上和精神上檢討一九五〇年條約（旨在解決尼泊爾要求印度人前往尼泊爾工作須申領工作許可證的限制）；(三)解決貿易、轉運、防止走私和重要消費品如何供應等問題；(四)全面經濟合作；(五)安全感和相互瞭解。¹⁶如果根據這些原則而尼泊爾接受印度的條件，那麼尼泊爾不僅喪失外交獨立權，而且其地位等於印度的保護國，不僅尼泊爾國王不會接受，御用的國會也持反對的立場。因此在這種不平等的條件下，尼泊爾與印度政府間的談判始終無法獲得共識，可是尼泊爾國內因印度的封鎖，經濟狀況極度惡劣，暴力事件層出不窮，許多學校都已停課關閉。於是過去被禁止活動的尼泊爾國大黨和其他左翼黨派乘機鼓吹民主運動，所以在不到一年的時間內，尼泊爾國內支持民主理念的團體紛紛成立，同情民主運動的人士也愈來愈多，於是到了一九九〇年初，這種由不滿王室專制統治的民主運動，終於因軍警的鎮壓而點燃了抗爭的戰火。

民主改革終於獲得勝利

一九九〇年初，尼泊爾和印度兩國間的貿易和轉運條約失效已達十個月，這場糾結看來仍然很難獲得解決。尼泊爾政府在國際間雖然得到許多口頭上的支持和同情，但是實質上的幫助，則因為運輸的困難而無補於事。而尼泊爾國內則因為舊有政治勢力要求開放以政黨為基礎的選舉，成立具有民意的國會，以及削弱國王權力的呼聲居高不下，再加上人民因物資缺乏而開始蠢蠢欲動，於是尼泊爾蟄伏已久的政治領袖，眼看民主運動從蘇聯而橫掃東歐，甚至於亞洲的外蒙也實行民主改革，這一民主浪潮對尼泊爾的民權領袖而言，無疑具有莫大的鼓舞和啟發作用。

註14 *The Times of India*, 22 June, 1989, p. 1.

註15 *The Times of India*, 20 June, 1989, p. 3; 15 July, p. 11.

註16 *The Times of India*, 30 June, 1989, p. 1.

主導尼泊爾民主運動的主要政治勢力就是「尼泊爾國大黨」(Nepali Congress Party)，這個受印度國大黨所支持的黨派在一九五〇年就成立在印度境內。一九五九年二月，尼泊爾舉行第一次自由選舉，國大黨以贏得絕對多數議席而組織政府，可是這一短命內閣，不到兩年就在一九六〇年十二月遭前國王馬亨德拉(King Mahendra)所廢，國大黨的領袖及內閣閣員均被拘捕。從此尼泊爾國王成爲一個擁有絕對權力的君主，而所謂的「元老會議」(National Panchayat)，雖然具有國會的形式，但是並非由國民直接選舉產生，只能說是顧問性質的御用工具而已。

一九九〇年二月十八日，尼泊爾國大黨和馬列聯盟(United Marxist-Leninist)這兩個在「元老會議」中最大的派系，再聯合其他左翼人士，要求比蘭德拉國王，立即解散「元老會議」和御用內閣，並發起群衆運動，進行罷工、罷市和罷課，並進而要求國王開放黨禁，實行民主選舉，可是頑固的王室不但不願接受，而且由於警察開槍射殺群衆，終於使原爲和平性質的群衆運動，變質成爲一場全面的動亂。^⑯這場前後長達兩個月的流血衝突，迫使國王比蘭德拉向民主浪潮低頭，首先將鎮壓民主運動的首席瑞斯塔免職，接著開始與反對派人士舉行談判。談判期間尼泊爾國王深知民主潮流難以抵擋，而且尼泊爾國大黨的背後又有強大的印度在撐腰，因此爲了保留一部份殘留的王室權威，最後終於同意廢除傳統的「評議會」制度、開放黨禁、修改憲法、籌組臨時政府。一九九〇年四月十八日，比蘭德拉國王任命尼泊爾國大黨主席巴塔雷(Krishna Prasad Bhattarai)爲首相，組織了一個包括左翼聯合陣線在內的十一人內閣。同年九月，尼泊爾各黨派與王室開始討論新憲法草案，經過將近兩個月的折衝，最後雙方在互有讓步的情形下，通過了尼泊爾新憲法，國王同意將行政大權讓給民選的政府，從此尼泊爾成爲一個君主立憲的國家，不過比蘭德拉國王在新憲法中還保留一份殘餘的仲裁權，以便在國會大選後，如果沒有任何政黨獲得絕對多數議席時，國王有權邀請任何有能力湊成過半數議席的政黨領袖組織內閣，因此少數黨領袖亦有機會組閣。此外尼泊爾國王可以不必經過內閣的同意，得宣佈緊急狀態，國王之所以堅持這項殘餘權力，主要在保障國家安全。^⑰

根據尼泊爾於一九九〇年十一月九日公佈的新憲法，尼泊爾於一九九一年五月十二日，舉行卅二年來第一次真正的民主選舉，以便選出二百零五位國會議員，參加角逐議席的政黨，以尼泊爾國大黨、馬列聯盟和尼泊爾民主黨(Nepal Democratic Party)爲主。選舉的結果，尼泊爾國大黨因獲得一百一十席多數而組織內閣，馬列聯盟獲六十九席，如果與其他左翼黨派合計，左派共贏得八十二席，尼泊爾民主黨僅獲一席。^⑲這次尼泊爾的大選，各政黨競爭非常激烈，但是過程却相當

註^⑯ *The Times of India*, 19 February, 1990, p. 1.

註^⑰ 同註^⑯，頁二三六～二三七。

註^⑲ Fred Gaige and John Scholz, "The 1991 Parliamentary Election in Nepal: Political Freedom and Stability," *Asian Survey*, November 1 1991, pp. 1040～1043.

平順，幾乎沒有發生暴力事件，實在可以稱為一次公正而公開的選舉，足可以成為第三世界的典範，可是美中不足的是尼泊爾國大黨領袖巴塔雷在選舉中失利，新首相一職由尼泊爾國大黨總書記柯伊拉拉（Giri ja Prasad Koirala）出任。當新內閣於五月二十九日宣誓就職，當年代表印度與尼泊爾談判貿易和轉運條約的印度外長勞奧，現在已是印度的總理。一九八八年尼泊爾與印度兩國為了貿易和轉運條約而相互交惡，三年之後，尼泊爾因此一問題而改變政治制度，使尼國由一個君主專制國家，一變而成為君主立憲國家，這一戲劇性的變化，印度無疑曾扮演了重要的角色，而印度將一個即將倒入中共懷抱的尼泊爾，重新塑造成為印度的可靠伙伴，這不能不說是印度外交上的一大收穫。現在印度與尼泊爾兩國有關貿易和轉運條約雖然尚未簽訂，但是早在一九九〇年六月十日，由於尼泊爾國王比蘭德拉同意放棄固有權力後，印度同意開放兩國邊境的全部十五個關卡，使得尼泊爾人民得以恢復生產，尼國的經濟狀況也大為改善。從另一個角度看，尼泊爾在一九九〇年五月已正式通知中共，將前政府所購買的最後一批軍火立即停止裝運，²⁰所以尼泊爾政局的變化，似乎也可以說是中共外交政策的挫敗。

註²⁰ 大公報（香港），一九九〇年五月二十六日，版三。